

★ 中国文化书院出版部主办 《改革丛书》

杞者梦

樊云芳 著

华夏出版社

记 者 梦

樊 云 芳 著

华 夏 出 版 社

记 者 梦

樊云芬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玉田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7.25印张 20千字

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80053-628-9/1·170

定价：3.15元

内 容 简 介

你了解改革的年代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苦与乐吗？你想知道一个善体人意的记者是怎样敲开一个采访对象的心扉并与他们结成战友、朋友与密友的吗？你了解写作灵感的火花是怎样在记者呕心沥血的采写过程中迸发出来的吗？你掌握一个处于弱者地位的记者在新闻竞争场上“反败为胜”的“秘密武器”吗？你想一瞥记者五光十色、万花筒般的日常生活吗？你想知道一个发表“豆腐块”的小报通讯员如何在塞外古战场虔诚地追求记者梦、终于变成《光明日报》主任记者的吗？

本书是我国中年女记者樊云芳的新闻采写札记集。樊云芳曾4次获全国好新闻奖，5次获省、部级好新闻奖。她的新闻作品选《我就是我》在我国的新闻爱好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她撰写的关于“中性”报道与“全息”报道的论文与论著《新闻文体大趋势》亦在新闻界同行中引起了重视和关注。《记者梦》既是她心灵的独白，又是她10年记者生活的白描，文笔生动优美，读来富有生趣并发人深思。

目 录

记者梦.....	(1)
不露痕迹的“导演”.....	(11)
注意：你在研究采访对象， 采访对象也在研究你.....	(18)
采访四忌.....	(25)
现场的魅力.....	(35)
奇妙的冶金术.....	(43)
灯光布景和画外音.....	(54)
新闻要歌唱时代的主旋律.....	(62)
从学术论文到趣味科普.....	(70)
“新”的追求.....	(79)
把读者带到新闻发生的现场.....	(90)
人物新闻——眼睛的特写.....	(100)
简练些，再简练些.....	(106)
追求采写录.....	(112)
当处于弱者地位的时候.....	(126)
《苏南水乡拾英》采写札记.....	(138)
中性报道——对突破旧新闻模式的几点思考 和探索.....	(144)
改革的呼唤 《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采写录.....	(155)

选准主题写来顺手一次成功

错选主题三易其稿几濒绝境.....	(169)
全息的眼，全息的笔.....	(174)
一个别具一格的新闻领域.....	(182)
从“没有什么新闻”的地方发出的好新闻.....	(194)
预测报道要留有充分余地.....	(202)
新闻记者也须从古代史著中汲取营养.....	(205)
记者与读者.....	(213)
一道划破漆黑“夜空”的“闪电”.....	(218)
记者“夫妻店”.....	(221)

记 者 梦

还在大学时代，我就做着记者梦，虽然我学的不是新闻而是哲学。

这个梦萌生于一篇振聋发聩的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我跟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捧着报纸流泪，听着广播流泪，我把从报上剪下来的焦裕禄的照片夹在日记本里珍藏，焦裕禄的形象与想当记者的心愿一齐在心底里扎下了根。

“要是我今后能当一名记者，并写出一篇象《焦裕禄》这样震撼人心的报导来，这一生也就不算虚度了。”我想入非非。

“文化革命”的狂涛，击碎了我的记者梦。大学毕业，一列火车将我与未婚夫丁炳昌从东海之滨的上海拉到了北方的滹沱河畔，在那里的军农场里我们种了两年水稻。

又一列火车把我和丁炳昌送到当初杨家将打仗的古战场——山西雁北。

列车奔驰在太原——大同的路上，外面的景色越越来越荒凉，望不到头的茫茫黄土地，单调、沉闷，偶然有几棵干

树，或一滴干打垒的土窑房一闪而过，看不到一点绿色。而据说要去工作的浑源县比这还要荒凉，那里的人“野蛮”得还在吃树叶、披羊皮……我们是去“改造”的，就象当年林冲发配沧州，去时有日，归时无期，凶吉难卜，前途茫茫。

我心酸地想起曾有过的记者梦：一个美丽的梦，一个遥远的梦，一个破碎的梦。

但上苍的安排偏偏是这样的出奇：正是在这块荒漠的土地上，我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

揭开严酷的外表，你会看到在这块荒漠严寒的土地上也有生活、奋斗、理想和追求，也有友谊、理解和爱情。这里的人虽然生活艰苦，外表粗犷，但也有丰富的内心、真挚的感情。当代人与自然界的悲壮搏斗胜过杨家将的传奇。

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笔。

我正式发表的处女作是《大坝颂》，它记叙一个大队党支部领着群众取石修坝，制服了洪水。稿子写了一万多字，发在《雁北报》上只有300字，我已高兴得不得了，捧着报纸连读十来遍，还舍不得放手。

一天，我在什义号大队总结妇女材料，来了一位《山西日报》老记者申元则。“你把它写成稿件，直接寄给我。”他亲切地建议。看我已经怀孕，他邀请我坐他的小卧车一起回县，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跟一位真正的记者打交道，也是生平第一次坐小卧车。“土豆”味十足的我，怎么也打不开车门，他走过来帮我打开了车门，装作没有看见我的窘态，我从心底里感谢他。

我发奋写稿。怀孕七个月时，我还坐着生产队来县里拉化肥的大车下乡。马车颠簸在乡间土路上，两边地里的老乡

望着我这个“高高在上”、腆着腹部的“下乡女干部”，又惊讶，又逗乐，我也乐，冲着他们直笑。还有一次，为了现场采访我的主人公——县线材厂厂长武荣，我独个儿踩着嵌在井壁上的钢筋，爬到了百米深的井下，我累得出热汗，他在底下看得冒冷汗，等我双脚落地，他才呼出一口长气：“没见过你这样胆大的女人。”

有一年除夕，从一大清早，丁炳昌和我就趴在窗前一张小桌上不停地写呀写，县委的同志们从窗前走过，总要驻足张望，敲敲玻璃：“喂，面果子炸了没有？”“炸了，炸了。”我们回答这些好心的同事。等寄走稿子，天已渐黑。回到冷清清、空落落的小屋，丁炳昌问我：“怎么办？拿什么过年？”我耸了耸肩膀：“老办法，土豆炒元白菜。”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正巧两个上海老乡来串门，见状回家给我们拿来冻豆腐和红烧肉——好一顿美餐！

那一年吉星高照，接连有三、四篇稿件在山西日报社获得好评。“查一查，谁写的？”报社领导发话了。于是，我们这两个小人物的名字被报到了报社。

第二年，《山西日报》一位副总编亲自来到浑源，与县委商量调我俩去报社。

但对于我来说，记者梦真正变成现实还是在四年之后。1978年9月，我已调往雁北地委通讯组，刚跟人合作采写完一本书，突然接到省委宣传部的长途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告诉我：“你是樊云芳吗？我们已推荐你去《光明日报》山西记者站，如你本人没有意见，请立即来太原。”对方早已放下耳机，而我却捏着话筒象傻了一样，我不明白自己是在做梦还是醒着。

事后才得知，是由于省里一些老新闻工作者的热诚推荐，我这个既无名气、又无“靠山”的小人物，才得以“福从天降”。

从萌生记者梦，到真正领到一张红皮烫金的记者证，整整经历了13个春秋。

1979年元月，光明日报社召开全国记者会。记者部主任卢云向大家殷切致辞：

“……希望在座的同志中，今后能出一批名记者。什么叫名记者？就是他的名字一在报端出现，就会引起读者很大的注意，同样一条新闻，他的报道能比其他记者的报道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坐在后排的我听痴了：原来可以这样解释、这样理解名记者。如此看来，要么不当，要当就当名记者……这个想法在脑海里一闪，就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嘿！你领到记者证才几天？连头版消息也上不去的一个末流记者，竟然异想天开，做起名记者的美梦来了！

但话说回来，记者工作实在令我醉心。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也可能是因为我苦苦追求了它13年，一旦如愿以偿，就格外珍惜。

我喜欢记者生活的丰富多彩，天地广阔。往往是：上个月在工厂采访，这个月就来到了农村或林场；上午还在大学教授的实验室里，下午又出现在歌舞团的排练场。我结识了一个又一个教师、科学家、厂长和经理，津津有味地听他们叙述自己的欢乐和苦恼。每采访一个人，就多认识一颗心灵，多接触一个生活圈子，就打开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社会生活原来是如此五彩缤纷，人的心灵世界原来是如此奥妙无穷，人类知识的海洋原来是如此浩瀚无垠。我惊叹万分，

又喜之不尽，就象一只刚从小天井里飞上蓝天的鸟儿，一条刚从小河沟游过大海的鱼儿，欣喜若狂地飞翔于广袤的长空，遨游于辽阔的海洋。我眼花缭乱，饥不择食，只恨自己这支秃笔无力反映出我所见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万分之一。

有一次在出差的火车上，一个女邻座听说我丢下丈夫、儿子常年在外头奔波，便以怜悯的眼光看着我，感叹道：“女人当记者，真是受罪……”一定是我脸上反感与愠怒的表情吓着了，她吞下后面的话，悻悻地扭过脸去望着窗外。

我这个人天性就有点“喜新厌旧”。现在，为了把自己看到的万花筒般的生活真实地再现给读者，我用心追求写作上的构思新颖，文字上的优美抒情。我不是新闻系科班出身，所以头脑中没有传统的格式，只一味寻想能准确地、生动地表达内容的形式和文字，有时一连列出十几个导语，有时已经走到邮局，刚要把稿件投进邮筒，突然脑子里又冒出新的点子，于是急急忙忙跑回家，铺开稿纸，重起炉灶……

我练习用“倒金字塔”手法写短新闻。在写人物通讯时，借用报告文学中的抒情和议论；也尝试把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引进人物新闻的写作，把慢镜头和特写镜头引进新闻特写……“你这到底是消息还是通讯？怎么有点四不象？”一开始，有的编辑这样问我。我惶然，回答不出来，因为我自己也说不清。慢慢地，这种“四不象”的报道在报社得到了认可。有人说，她想有所创新，很好嘛。有人说，她的报道有那么一点自己的风格。我听了，又惶然，因为从我的本意来说，既不是有意去“创新”，也不是有心要立什么“自己的风格”，而仅仅希望象一匹野马一样在大草原上奔驰。但现在报社这么鼓励，反倒促使我去思索这个问题，并真的追求在报道中

有一点自己的“个性”。我力求在新闻作品中能奉献给读者一点点属于我自己的独特的构思、独特的文采、独特的新意和感受，并渴望这“一点点”能为读者所品尝、所理解、所认可、所喜爱。

新闻工作还有一点特别合我的心意，就是它可以利用舆论的力量，去颂扬正义、鞭鞑邪恶。有些人为非作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见报。当然，作为一个普通记者，力量是极有限的，但我喜欢打抱不平，甚至帮人打官司。一次，一个中年男子怯怯生生地走进我的办公室，诉说了这样一件事：他全家六口人，有五个是教师，妈妈从教30年，为了分得一间房，跑了领导家不下50次，最后，只分给一小间四面漏风的板壁房，而有的领导，本来就有房，这次又分一套新房。妈妈听到消息，一天哭了好几次，吃过晚饭，突然一头栽倒，心肌梗塞而死……

我压抑不住心头怒火，霍然站起：“走！去会会你们这位领导，真要象你说的那样，我倒要看看他新房住成住不成！”

“官司”从下而上一直打到市委，把市委领导也惊动了，最后，由于各方面的通力协助，终究给这个教师之家分了一套房子。

国庆节，这个中年男子又来了：“请你一定到我家里过节，全家都在等你……”“好，看看你家的新房子去！”我一口答应，兴冲冲地跟着他上路了。

但“官司”也有打输的时候。有一个工程师，因收业余咨询费被判刑两年（缓刑两年），20多个工程师为他联名上诉，省科协为他呼吁，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为他到处申冤，

我也为此找了有关方面领导，“官司”打了整整四年，案子还在拖着。这个工程师来我家不下一百次！每次见到他，我就烦躁，就上火，同时，又感到力不从心、无可奈何，我愧对他那双充满了痛苦的眼睛……

有时候，我也愧对儿子怨艾的、甚至冷漠的眼神。记得那一年冬天，我还在山西。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上床睡觉之前，把一件毛衣团成一团，扔到我正在写作的桌子上。“你干吗？”我生气地问。可儿子竟背过身子去不理我。我扳过他的身子，只见他泪痕满面……

他叙述了事情的原委：上午，老师叫他到黑板跟前做一道题目，可毛衣袖口上脱落的毛线一直从课桌下拖到黑板跟前，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你妈妈又出差了？”老师问。“她在家，只管写文章，不管我。”同学们又笑了。

“回去找妈妈，让她今天就给你补好毛衣。告诉她，这是老师说的。”

我捧着毛衣，脸发烧了。深夜，我又查看了儿子的毛裤，膝盖上两个大洞就好象两只嘲笑的大眼睛，谴责我这个当母亲的没有尽到起码的责任。一股酸溜溜的东西涌上喉咙，我真想叫醒儿子向他忏悔自己的过失……，我打开箱子找出一团毛线，一边流泪一边给他打一条新毛裤，一直打到天明……

但作为一名记者，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自己的停步不前，不能再向读者奉献有新意有魅力的新闻作品。1985年下半年，我就曾面临这样的“绝境”。

那一年，在局外人看来，是我春风得意的一年，刚评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又当选全国三八红旗手，之后，又

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但实际上，我的业务却面临一场危机，内心感到空虚。因为我恐惧地发现，自己的一些新闻报道，虽在文字技巧上有提高，但其社会影响却还不如我刚当记者时写的《王小平作弊案》及长篇通讯《追求》等，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我的潜力已经挖尽了？是不是新闻这条路已走到尽头了？

由于失去了惯有的自信心，我变得畏首畏尾，一提起笔就有一种失败的预感，这种预感又反过来窒息了我的创造力，报道越写越没有灵气。偏偏一些好心的同志还经常提醒我：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大家都在看着你，要不断拿点好东西出来呀！

很少失眠的我，在党代会期间通宵失眠了。

这样下去不行。我对自己说：首先要甩掉“荣誉”这个“包袱”，这些“头衔”本来就不是自己追求的目的，此时此刻，应将它们置之度外。

其次，不要过分追求技巧，而要着意追求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两者之间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实际上相隔万丈深渊。前者只能成为工匠，后者才有希望成为优秀的记者。

回到武汉，我翻出在雁北照的一张照片，土里土气的我，站在北岳恒山之颠，大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就是凭着这种自信和追求，我从那片贫瘠的高原起步，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记者梦并有了今天的一点点成绩。哦，当年那个充满自信和激情的年青通讯员是多么可爱啊！我要重新找回这个失落的我，把取得的成绩一笔勾销，就象当年那样从零起步！

1985年10月—1986年10月，我在湖北京山县采访了两

个月，在广州军区采访了一个多月，在湖南采访近一个月，其余时间在北京和武汉写稿采访，连续在《光明日报》发了13个头条（4条消息、9篇通讯，有的与其他记者和通讯员合作）。我决意到生活中、到读者中，去重圆那个纯真的记者梦，找回一个新闻记者的使命感。

在这期间，心中的那个“魔鬼”——失败感时不时冒出来作祟，要赶走它比写稿本身还要伤神费力。有几次，我感到身心交瘁，甚至渴望静静地躺下，再不要醒来。

自信，缓慢地在搏斗中复苏。成功终于在难产中降生。其标志是在1986年陆续发表的两篇长通讯《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对一个研究所所长停职又复职的议论》以及长篇调查报告《当代大学生的〈自画像〉》，无论在思想深度与写作手法上，都比自己以前的报道有所突破。这三篇报道是我与其他记者、通讯员合作采写的，是报社充分肯定和支持的，它们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反思》，《光明日报》专门在头版开辟了一个专栏进行讨论，一个半月收到读者来信来稿达到1600多件（其中主人公本人收到约200封），这个数字突破了长篇通讯《追求》的纪录。

这三篇报道也引起了新闻界一些同行的关注，认为它们在突破新闻“禁区”，多角度、多层次地报道改革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一条新的路已出现在我的脚下。这条路究竟能走多远？我不知道。前方又隐伏着什么新的危机？我也不知道，往前走吧，别害怕，也别想那么多。只要太阳还在当空照耀，只要中国的改革大业还在前进，只要那个纯真的记者梦还在我的心头燃烧，路，就不会穷尽，任何沟壑

都挡不住一个正直和勇敢的新闻记者的脚步！

是的，当一个称职的记者，一个对读者有魅力的记者，是多么难啊！但又是多么幸福啊！

不露痕迹的“导演”

——谈面对面采访的艺术

当我提着文件夹，敲开一扇门，见到了自己的采访对象，并与他（她）一起坐下来交谈时，我明白，我应该是这场即将开始的谈话不露痕迹的“导演”。这决不是指要让对方说迎合自己心意的话，而是指：我应该设法使对方乐于开口，并且使谈话始终围绕着自己想要了解的主题。

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轻松自如的

气氛，让采访对象“放松”

1983年盛夏，我去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采访武汉市护理界的后起之秀朱桃英。在病房办公室里，她拘谨地坐到了我的对面，眼睛盯着我已经打开的笔记本，涨红了脸，绞着双手，结结巴巴地说：“请不要采访我，我没有先进事迹，我没有……”

对于她有没有“先进事迹”，我已经从受过她护理的病人那里了解了不少，但此刻，为消除她的紧张心情，我顺从了她的要求，收起了笔记本和钢笔。“好吧，我们今天不谈这个。”我笑了笑说：“我们随便聊一聊。我家有个病人，已经躺了两个月（这倒是真的），听人说，三分医治，七分